

中篇小说集之一

名誉主编

柯灵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投机家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
中篇小说集之一

投机家



名誉主编

柯灵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投机家 / 本书编委会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6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ISBN 7-80622-845-4

I. 投... II. 本...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24051号

投 机 家

本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 俞子林

装帧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张绍军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0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出版日期 2002年6月第一版 200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845-4/I·174

定 价 22.00元

卷 首 语^{*}

柯 灵

编选《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这套丛书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人们对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重视。这套系列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

1999年9月8日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作家阵容泾渭分明。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大东亚和平共荣”,而有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置生死不顾,千方百计,发表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

1999年12月27日

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四十年代现实生活,也可以有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作品不拘风格,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要以上海为背景,也可以扩至其他地域。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内地作家来沪,他们的作品背景和题材更广泛,足以反映全国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抗。

2000年3月14日

“系列”要做到“作家多、作品好”。让人们知道四十年代的上

海有广大的作家阵容，也发表了许多有积极意义和写作水平很高的优秀作品，是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宝地。这也是编纂这套“系列”的意义和目的。

2000年4月3日

* 卷首语原定请柯灵先生撰写，由于先生不幸逝世，未及写成，兹根据他生前对《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编辑工作的口述记录整理，以代卷首语；并借此以纪念柯灵先生对本书编选工作的关心和指导。

前 言

袁 鹰

—

世纪之交,有机会重读一批上海四十年代的中篇小说和别的文学作品,仿佛重温久已化作云烟的旧梦,重晤睽别多年的旧友,不觉神思恍惚,竟忘却身在何处。

想起遥远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1940年到1949年那十年,就感到无论是中国还是上海,都是极不寻常的年代。四十年代开始时,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亡的战争正进入艰苦的岁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初又发动血腥的“皖南事变”,加紧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国共产党在辽阔的战场上领导军民奋勇打击日寇,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四十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二战”结束,中国随之进入决定民族命运的大较量、大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终于推倒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掀开了千年青史的新页。那十年中,战火纷飞,时局动荡,强暴欺凌,人民觉醒。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希望与沉沦,无时无刻不在冲撞、嬗变、交锋,你死我活,相互渗透,相互消长,古老的中

华民族，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在经历着一次空前未有的血与火的大洗礼。

四十年代的上海，经历了三段截然不同而又相互连结的时期。前两年，上海大部分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保留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块“孤岛”，抗日爱国力量利用这个特殊环境的特殊条件，通过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种种武器和工具，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起、抗敌救亡的斗志。当时“孤岛”上报纸、刊物、话剧、歌咏活动和文学创作蓬蓬勃勃，吸引着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读者和观众，尤其是青年人。有些在大后方不能出版的文学作品，不能上演的戏，只要没有明显直露的抗日言词，在“孤岛”上反而可以问世，形成中国当时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象。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地区日军随即侵占租界，悬挂太阳旗的战车隆隆驶过外白渡桥，碾碎了为时四年的“孤岛”岁月，整个上海成为黑暗、恐怖、使人窒息的地狱。有些老作家不得不隐姓埋名，潜居市井。中青年作家只能巧妙地避开敌人鹰犬的耳目，曲曲折折地写自己要写的作品，有如荆榛中的野草，石板下的苗芽，悄悄地在敌伪控制的报刊上透露些春天的消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上海重又成为新旧力量斗争的一个主战场，革命的、进步的文化阵地，比“孤岛”时期广阔得多，力量也雄厚得多，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有一度非常活跃。1947、1948年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以后，文艺活动受到种种压制，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四十年代这样一个方生未死的年代，一个充满战乱、动荡、搏斗的年代，在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又具有“五四”运动后丰厚的新文学基础的中国文坛，必然得到充分的、多方面的反映。作为中国最大都市的上海，作为新文学运动重要基地的上海，那十年中同样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景象。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们，在特殊的环境中、特殊的条件下执笔，他们既不能像三十年代的进步和“左翼”作

家们那样热血沸腾地反映时代,接触现实,写出《子夜》、《家》、《雷雨》、《大堰河》、《八月的乡村》,更不能像同时期解放区作家们那样自由自在地放手写《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王贵和李香香》。然而,他们仍然沿着“五四”和三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描绘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直面悲欢离合的乱世人生,赞颂讴歌真、善、美,鞭挞暴露假、恶、丑。从他们的笔下,读者们鲜明地看到“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看到豺狼遍地、魑魅横行的同时,仍然有正直、善良、正义的人性,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温馨,有林中的响箭,也有穿透暗夜的晨曦。也许是战乱动荡的年代比较难以安下心来创作长篇宏构,小说家们在那一时期大都钟情于中篇和短篇小说,运用这个形式,似乎较易于多方面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也较易于表现各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即使有长篇小说问世,也多是十几万二十几万字的篇幅,很少有三四十万字或更多的。那么,让我们现在就来约略浏览一下中篇小说吧。

二

“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三十年代从上海开始问世的。有的文学史家认为鲁迅 1921 年 4 月发表的《阿 Q 正传》揭开中篇小说的序幕,不过那只是一家之言,而且并未得作者本人生前认可,它是作为短篇小说编入《呐喊》中的。茅盾的《动摇》、《幻灭》、《追求》三部曲,巴金的《雨》、《雾》、《电》三部曲,蒋光慈的《野祭》、丁玲的《母亲》、胡也频的《光明在我前面》、柔石的《二月》、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沈从文的《边城》、郑振铎的《桂公塘》、老舍的《我这一辈子》,三十年代中先后都在上海出版,大约都可以算作现代中篇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中篇小说与长篇和短篇在字数上的界限,说法不一,通常算法,大约从两三万字到十万字以内,都作为中

篇。)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重镇的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代书局先后推出“中篇创作丛书”、“中篇文丛”，一时蔚然成风，带动了不少小说家向这片新的园圃进军。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到1937年的十年间，出版了约二百部。这就为上海也为中国后来的中篇创作奠定了基础。

本书收入的巴人(王任叔)的《一个老地主的故事》，不仅是上海作家四十年代最早的中篇小说(发表在当时大后方)，且是巴人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之一。巴人是“孤岛”时代上海进步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一员主将。那时他团结一批爱国的革命的作家，继承鲁迅先生的战斗传统，举起杂文这个锐利武器，同周围的魑魅魍魉进行勇猛的无情的韧性战斗，伸张正义，挞伐邪恶，发扬正气，振奋人心。这篇作品，以冷峻的笔法刻画一个威镇乡里的地主的一生，用仁善道德掩饰残暴，用伪善隐藏狡猾，终于在群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作家在小说结束处有画龙点睛的两句话：“以残暴而求得权力的统一，崩溃的却在自己的一边；对革命而施残杀，自己却不免被革命消灭。”具有深邃的警世意义。四十年代是巴人文学创作方面收获最多、贡献最大的年代。建国以后，他先当外交官，后来主持出版事业，十年动乱中横遭摧残迫害，最后被送往浙东家乡，在精神失常中结束作为革命家的一生。今天我们重读他六十年前的旧作，仍然抑制不住深沉的悲愤和慨叹。

四十年代初期的中篇小说创作，在“孤岛”和后来沦陷的时期发表，囿于当时环境，不能充分揭示对人性的桎梏与摧残，更不能直接展现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作家只能选取一个侧面，剖析光怪陆离的现实，隐晦地抒写自己的爱憎。束纫秋(越薪)的《投机家》堪称“孤岛”时期中篇小说的一篇代表作。一群挖空心思发国难财、拼命操纵搅动小民经济生活的投机家，利欲熏心，惟利是图，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全不顾老百姓死活，更谈不上国家民族意识。这些吸血鬼，在作者冷峻的笔下，一个个活龙活现，丑恶的灵魂毕露。

他们的气派和手面自然比不上《子夜》里的人物,却显示出“孤岛”时期的特点。作者后来回叙自己那个时候“曾想有计划有系统地注意一些材料,记录一点有影响的景物。比如在《投机家》这篇小说的题目下,就有一个副题:‘国难在上海之一’。这表示了打算写一组这样材料的想法,也确实陆续写好了几篇。但黑暗已经到来,争取公开发表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束之高阁,期望天亮”。(《蹄下小景》后记,1985年6月出版)这是当年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作家文人学者们共同的愿望和心情。可惜作者后来未能完全如愿。《人与人之间》作者满涛(方晓白),从一艘由马赛开到远东来的法国轮船四等舱一角,描绘一群中国旅客的众生相: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青田小贩,为贫病所迫买假护照回国、“情愿病死在家乡只要埋葬在祖坟里就好”的“痨病鬼”,自吹在巴黎“读政治”要回国参加抗战,开口闭口辱骂自己同胞“劣根性不可救药”,一听到重庆被轰炸的消息就立即吓得改道去香港作寓公的洋奴。作者用白描的手法,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同情和谴责,写作手法很像他所熟悉的十九世纪旧俄文学作品。满涛作为优秀的翻译家写的小说并不多,重读这个中篇,我们也对动乱中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增添许多缅怀和哀恸。

三

越薪说的“黑暗已经到来”即上海完全沦于敌人铁蹄之下以后,一时间众芳芜秽,百卉凋残,挂洋商招牌的报纸和各种文学杂志纷纷停刊,黄浦滩上一片萧条。但是,尽管环境险恶,豺虎横行,能够供作家驰骋的天地十分逼仄,严寒冰封却不可能扼杀一切生机,一部分作家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们被粗暴地剥夺说话和写作的自由,有口不能言,有笔不得写,但是,又为爱国正义和人性良知驱使而不得已于言。他们不愿沉默,于是就有意识地避开

敏感的政治漩涡,同尖锐的现实拉开一些距离,或者用历史题材隐晦影射,或者用身边琐事委婉铺陈,向广阔复杂的人生寻觅新的着墨点。老作家王统照隐居中用不同化名写了好些小说,他用本公署名的《双石驿》,以清代西北兵营作背景,渲染一段传奇性侠义故事,人物性格突兀鲜明,虎虎有生气。最后所引的那首五言绝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可有不平事?”壮怀激烈,发人深思,留有悠悠不尽的回味。刘以鬯用浪漫迷幻情调写成的《露薏莎》,显示了小说家另一方面的新走向。《露薏莎》作于沦陷后的1942年,当时并未在上海发表。它写“一家有酒有歌有女人的夜总会”里一个白俄血统的舞女,在纸醉金迷中并未泯灭良知,最后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被日本兵枪击的抗日分子,闭上眼睛前说的一句话是:“去吧,到大后方去,帮助你的祖国赶走暴虐的侵略者。”读者们会发现不太熟悉的灯红酒绿中也有善良的人性,也有未被腐蚀的灵魂。这样的作品,那几年还出现不少。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组成了特殊年代的上海风情画。

沈寂(谷正魁)的《大草原》同他另一些短篇小说《鬼》、《大荒天》、《盗马贼》带着读者远离上海这座乌烟瘴气的大都市,让我们走入完全陌生的天地,去见识陌生的生活和陌生的人物,呼吸到一股强劲、剽悍的气息。上海的读者常见的是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的爱情,哪见过如此强烈、粗犷的感情纠葛?不禁目眩神摇。当年我读到《大草原》时,几乎立即联想起早几年读到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新奇感受。其实作者另有一番苦心,他后来回忆自己在上海读大学开始写作时的心情:“军国主义铁蹄蹂躏我国土,屠刀残杀我们同胞,人的生命不如蝼蚁,但仇恨和希望始终蕴藏在人们的心底。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犹如被关在樊笼里的小鸟,失去自由,向往光明,只能瞭望外面广阔的天地,发出微弱的反抗的呼鸣。”这种心情,这种梦想和追求,几乎是当时上海青年作家所共有的。

上海四十年代前期的文学读者,可能都还记得施济美和另外几位“东吴女作家”们的名字,那个时期不少男女文学青年对她们的崇拜,不亚于近一二十年风靡于台港女作家的“追星族”。她们的作品,宛如江南小巷里卖花姑娘篮中的栀子花、白兰花,带着朝露的清香,在太多的声色犬马作品中保持几片干净土。施济美多写短篇,这篇《井里的故事》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是她创作的成熟期,似乎仍是短篇结构,依然显示了作者纯情、清婉和细腻的风格。施济美在建国后命运坎坷,以中学语文教师终老,“文革”动乱中不堪凌辱,被迫害离开人世,令人不胜唏嘘。

张爱玲带着她的中短篇小说于1943年左右登上沉寂的上海文坛,她独具特色的才华和艺术技巧使她很快便成为红极一时的女作家。《金锁记》那段开头,曾经为许多人赞赏:“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如今到了世纪之末,又过了五十多年望回看,想起这位走了一生“辛苦路”终于悄然客死异邦的女作家,“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而在四十年代,这颗在暗夜里倏然升起的新星,不仅使许多青年男女读者倾倒,成为小报编辑记者追逐无聊新闻的对象,也引起韬光养晦的老作家们的关注。老作家傅雷冷眼旁观,曾用化名在柯灵接编后的《万象》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剖析《金锁记》和《连环套》的得失,高度评价她的艺术技巧,也善意地指出她的不足。柯灵先生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提到此事时,论及“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

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傅雷先生此文行文委婉，立意明确，对当时“一般新文学作品”不重视艺术技巧的欠缺，不能不说是一副苦口良药。收入本选集的《心经》，同《倾城之恋》、《金锁记》一样，是张爱玲四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

乱世年月，为贫困所迫的知识分子们驮着比黎民百姓加倍的心灵重荷。他们良知未泯，爱国爱民的热火未熄，不愿做铁蹄下的顺民，却不得不面对横暴的处境逆来顺受；他们不愿像周围一些自甘堕落的人沉沦下去，却又不得不为家庭妻小的生计忍辱负重。彷徨无计，度日如年，求死不能，求生不得。我们可以从吴岩的《株守》中听到他们无可奈何的叹息、颤悸和挣扎。同类题材在上海完全沦陷的三年多里出现得不少，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中更多。读者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去找寻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差不多同一时期，远在西南的田汉曾经愤懑地低吟：“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困居沦陷区的文化人“伤心”处比大后方的同道更深更重。在窒息的高压气氛下，还能忍着饥寒贫病，用一支笔曲折地写作，其艰辛窘迫情况，不知今天的读者能不能体会于什一？

即使从上海沦陷时期中篇小说的发展看，那几年的主流，应该说仍是“五四”和三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政治倾向从总体上看也是爱国、正义和健康的为主。真正落水附逆的文人屈指可数，他们那些狗屎不如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影响。今天若有人漠视这个历史事实，将沦陷区文学作品轻率地不加分析地加上“汉奸文学”、“色情文学”或其他帽子，就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

四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八年中“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作家们纷纷沿陆路和水路回到上海，带来他们的新作。那些仍滞留

大后方或是回到别处的作家,也将作品寄到上海来发表和出版。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艺复兴》问世,《中国作家》、《文艺春秋》、《文坛》、《幸福》、《人世间》等杂志也先后出版。一时间上海文坛确实呈现“复兴”的景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自由空气的空前高涨,整个中华民族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严峻考验,提高了政治觉悟,也增强了凝聚力。时代的巨大进步,自然要反映到文学艺术创作上来。作家们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心情,都大大不同于三十年代和抗战岁月,从中篇小说园地里,我们也能看到时代脚印。

上海这个中西交汇、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在文化艺术方面从来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的特点,对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不排斥,都能吸收。京派小说、海派小说、新文学小说、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武侠小说都可以找到发表和出版场所,都拥有自己的读者。那些思想反动、内容含有毒素、格调低下的,当然必定会遭到读者和同行的谴责和唾弃,不过那些总是少数,不会有多少生命力,也没有多少市场,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一时期中篇小说的作者,并非都是上海地区的作者,写的也不都是上海的人和事,但在三十年代他们大多是从上海跨上文坛的,在上海地区以至全国都是知名作家,读者自然欣喜地如同老友重逢一样迎接他们的新作。这些作品在反映时代、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较之战前有了新的扩展,新的开拓,创作风格和流派异彩纷呈。

如果说,在钱钟书和杨绛的作品里,读者还能够依稀遇到一些战前人物的影子,听到他们的一颦一笑,在沈从文的作品里读者也领略了战时云南边地一角的风情,虽然会感到有点生疏,但都能为他们精致而从容的艺术技巧所吸引,如同浏览一幅幅风景画而赏心悦目。那么,读到林淡秋、艾芜的两部中篇《暮》、《都市的忧郁》,就会止不住心灵震撼。它们虽然取材不同,产生故事的地区也不同,却共同地为我们展示了抗日胜利以后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城乡

血淋淋的现实。反动政府倒行逆施,贪婪地掠夺胜利果实,疯狂地发动内战,抽丁征粮,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甚至家破人亡。人民群众在痛苦中觉醒,在困境中奋起,必然要走上抗争的道路,跟着共产党推翻旧社会,寻求翻身解放。这几乎是四十年代后半期文学作品共同的趋向和作家们自觉寻找的主题。靳以的《母女》,更是用明白的语言和健朗的风格,透过一位新型中年妇女的言行,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沙汀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中篇小说卷》序言中指出:“中篇小说作者们面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身处国家何去何从之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对此采取不严肃的态度。实际上,就连过去时期一些标榜唯艺术观点的作者,这时也不再有游戏人生的嘻哈打笑了。不平凡的时代,磨炼、造就了许多小说家。”这一段话,对四十年代后期上海中篇小说的状况,也是完全适用的。

到上海解放前一二年里,物价飞涨,生计艰辛,社会动乱,特务猖獗。上海的小说家们看到黑暗的年代即将消逝,光明的天地就在眼前,却不能像解放区作家那样尽情地去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是他们仍然以暴露反动统治下人民的苦难、鞭挞无恶不作的邪恶残暴势力作为自己的使命,曲折地表达自己的追求与向往。《恶夜》和《戮夫》都以乱世黎民处于凶顽邪恶势力蹂躏榨压下水深火热中的呻吟挣扎为题材,写人性的扭曲和疯狂,儿子亲手杀死贫苦无依被迫卖身的母亲,妻子用刀砍死虐待自己的后夫。血淋淋的现实使人怵目惊心,也使人诅咒那个决不能让它再延续下去的社会制度。于是,我们从《洗马河传奇》看到了希望。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塞北草原上的传奇,却使人有一种亲近感和亲切感。作品明确地写了日本鬼子投降以后的解放战争,借一个老英雄之口对他的老伴说:“你别怕,咱们是老朋友,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也是老百姓……恨我们的是刘老爷那样吃人肉喝人血的人。”写草原上的战争,也直露地指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收复攻势,同时

也是人民为自由的最后一战”。“整个察哈尔省的人民又恢复了自由,寒冷的冬天过去,温暖的春天又跟着可爱的太阳来到北国了。”欣喜之情,跃然纸上。作品脱稿于1949年初,发表在1月至3月的《幸福》月刊上。我不记得当时是否读到过它,现在过了五十年再读刊物复印件,真有点惊讶一部倾向如此鲜明的作品那时候竟然能安然躲过反动当局的文网。可见那时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覆灭的命运,大小官员人心惶惶,只管自己仓皇逃命,再也顾不上对作家挥舞皮鞭了。这样,倒也成就了这部作品为四十年代的上海中篇小说涂上了最后一道亮色。作品的结束处,作者不无有点象征意味地写道:“洗马河静静地流着,河水充满了愉快的春泛,两岸的人民为自己去吸取河水灌溉,同时,也为自己洗濯着可爱的马群。”

果然,作品发表后不过两个月时间,1949年5月,上海的人民,上海的文学便带着欢笑,含着热泪,告别难忘的不寻常的四十年代,迎来了新时代的春天。

新世纪第一个新春,北京未了斋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投机家	中篇小说集之一
虹 桥	中篇小说集之二
喜 事	短篇小说集之一
一 吻	短篇小说集之二
迷 楼	短篇小说集之三
团 圆	短篇小说集之四
新 生	纪实文学集
长夜行	散 文 集